

解读
中国
书系

〔美〕李涪◎著 章晓英◎译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

美国能向中国 学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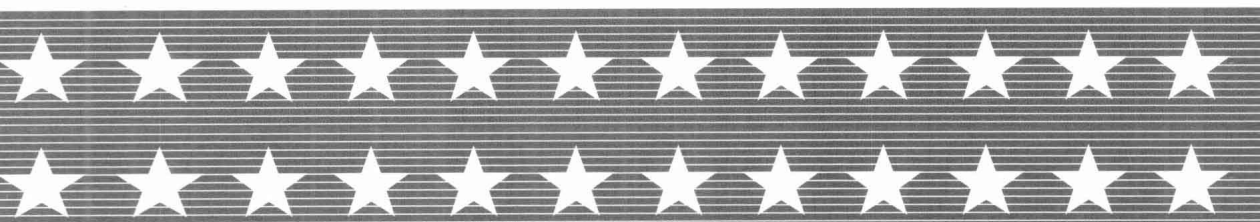
红旗出版社

解读
中国
书系

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

〔美〕李涪◎著 章晓英◎译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 / [美]李涪著. - 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2.9

ISBN 978 - 7 - 5051 - 2347 - 2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学 - 研究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501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2 - 3727 号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 AN OPEN - MINDED GUIDE TO TREATING OUR GREATEST COMPETITOR AS OUR GREATEST TEACHER By ANN LEE, FOREWORD BY IAN BREMMER

Copyright: ©2012 BY ANN L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ERRETT - KOEHLER PUBLISHER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ses edition copyright:

2012 Red Flag Pres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

著 者 [美]李 涪

译 者 章晓英

出 品 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张景涛

总 监 制 徐永新

责任编辑 张景涛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 - 64038529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 - 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 - 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1 - 2347 - 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英文版《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书评摘录

李涪认为美国应该向一个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学习。她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预测到了“大萧条”即将到来。现在，她讲述了中美两国如何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世界，我们都应该听听她的意见。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 查理·科布尔

人们对中国及其当前体制的误解甚多。李涪的书审视了中国体制及其优势，角度新颖。

——哈佛商学院雅各布·谢夫投资银行讲席教授 乔希·勒尼

作者对书中涉及的所有话题阐述得都颇有道理，同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有趣。这本书非常吸引人，将产生深远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创始董事 威廉·刘易斯

李涪在与那些中国威胁论者进行对话。通过审视中国成功背后的基本政策和态度，她指出，中国的经验教训可以把美国人带回到起点，让其重新审视那些最初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价值观和愿望。她的书与以往关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角色和作为崛起的世界强国的讨论有细微差别，非常及时。

——世界政策研究院院长 迈克尔·沃克

《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是当今有关美中关系的非凡之作。该书有着深厚的文化理解，内容丰富，价值不菲，评价客观，令人称快。书中触及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而这有助于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更加清晰地看待自我。

——雅礼协会执行主任 姚南溪

众所周知，尽管世人羡慕中国的成功，但美国却喜欢把中国当做其问题的替罪羊。本书有个崇高的目标：通过增加西方人对中国成功的理解，减少潜在的国际冲突。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依赖现代重商主义政策，也是学习西方优点的结果。作者主要观点更有意思：为了挽救自己，美国需要依靠中国，重新引进西方早已忘记的经验教训。这一读本应该成为美国时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抗衡。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经济学教授 兰德尔·雷

从广义上讲，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独到见解和关键信息，令人惊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每个人都必须了解和熟悉这些思想。无论是教育、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或商业，李涪都可以教给美国人和中国人许多东西。她比任何人都懂得我们还应该学什么。

——康奈尔大学金融学和 International 经济法教授 罗伯特·霍克林

该书摆脱了以往地缘政治辩论的单一视角，令人耳目一新。甚至那些看到中国体制严重弊病的人也会同意李涪提出的许多大胆的治国方略。

——《金融时报》记者 约瑟夫·门

代序

伊恩·布莱默

这是动荡时期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世界权力转移。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已逐渐改变，新兴强国成为不可缺少的中间力量，在处理一系列跨国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前，全球经济的驱动力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思想、信息、人员、资金、商品和服务，但在当今体系中，面对飞速的变化，政府用新方法使用旧工具，以掌控政治权力。

在美国领导人眼里，美国权力曾无与伦比，因此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讨论美国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掌控权力，而如今的美国已陷入自我怀疑和放马后炮的境地。美国已不再是以前的美国。美国曾以霸主自居，如今人们悄悄地谈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政治家们仍然提及美国社会“例外论”，借此驱除恐惧心理。今天，人们需要学习别人的经验，特别是快速崛起的潜在对手。美国人对此懊恼不安。然而，在当今世界，那些经验教训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宝贵。

这就是为什么李涪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回答。她深谙美中两国国情，可能没人能比她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吧？华盛顿用警惕的眼光看着中国国内的惊人变化。它的未来计划应该着眼于合作还是竞争呢？李涪指出，这是一个非真实选择。是的，人们普遍认为，

美中两国政府的政治价值观大相径庭，对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且，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削弱其政治体制。因此，因核心原则差异而导致的两国之间的摩擦不应让人们对事实视而不见。事实上，美中两国皆得益于中国的崛起。明智的政策应确保这种非零和游戏继续下去。当然，双方都要出对牌才是。

对中国发展而言，接下来的一步会更为复杂。对此，中国领导人比谁都清楚。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已出现“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象，因此新一代领导人会着手调整经济结构。至于他们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不得而知，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现在谈论“中国世纪”似乎还为时过早。

然而，中国是绕不过去的。当美国人在努力恢复其经济活力和平衡其民主力量时，他们不得不与一个基于不同原则之上的中国体制抗衡。美国公司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国企竞争（有时形成合作伙伴）。中国和其他走市场道路的新兴国家不会轻易地向西方机构妥协，或者按西方人制定的陈旧的游戏规则行事。美国将拒绝变化，然后挣扎着去适应。但是，李涪认为，如果美国学会在新的领域竞争并获胜，中国的崛起，无论以什么方式，并非意味着美国经验的衰落和失败。

如果美国愿意从中国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这个目标。李涪详细描述了中国的治国方略，而这些策略完全与兴旺发达的民主自由市场制度相吻合。美国人千万不能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信念，因为正是这些信念最初使美国繁荣昌盛。但是，我们制度中有时出现的过剩问题时刻提醒我们：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华尔街，短期的战术思维经常替代健康的长期规划。

美国可以从中国学什么？很多。

伊恩·布莱默：欧亚集团总裁，曾著有《自由市场的终结》。

前言

我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时，正好上二年级。除了广东话和普通话，我当时还学习英语，所以，同时接触两种文化，一种与我父母和朋友相关，一种是我在学校和工作中的亲身经历。我既需要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又必须吸收美国文化，这个过程让我掌握了重要的跨文化技能。

作为美国大熔炉的一部分和美国人，我心存感激。我在美国的经历也许并非特殊，但与许多美国人不一样的是，我经常去中国并且在那里住很长时间。1985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我陪母亲寻找她失散了36年的亲生母亲。那一年，我母亲从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父亲的男子那里得知，上世纪40年代，她与亲生父母失散了。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外公外婆离开了家乡。在没有征得我亲外婆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把我母亲带走了。当时她才三岁。我母亲家庭的其他成员并没有离开，因为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即将发生的内战会持续那么长时间。革命期间，她的父亲过世了。1985年，我的亲外婆身患癌症，生命垂危。同年，我的义外公与她重新联系上，并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听说了关于她父母的真相后，买了两张机票，于是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国。

当我和母亲踏上回国之路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到了杭州。我外婆在那里等我们。看到她和其他亲戚多年来忍受的贫穷，我很吃惊。走过一条满是牛粪的狭窄弯曲的泥泞小路，我们来

到了外婆家。她家有两间水泥地屋子。按当时标准，是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厨房只是一个简单的炉灶，卫生间是一个公共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和马桶。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城镇上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又脏又暗，墙面是一律的棕黑色，上面尽是煤灰和其他污迹。

那时，人们出行一般都走路或骑自行车，偶尔会看见政府用车。每个人都穿蓝色的中山装。我穿着白色体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当地人盯着我看，似乎我是从火星上来的。

虽然极度贫穷，但我碰到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很乐观，令我十分惊讶。我的一个叔叔从武汉赶过来看我们。他的职业是电气工程师，但在他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干农活。当他见到我时，他给我看了他绘制的各种未曾发明的电器设计图。他甚至异想天开，希望有一天与美国公司合作，还问我是否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我的堂姐妹姚群（音译）对中国的未来抱非常乐观的态度。她是唯一能说英文的人，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和我用英文对话，练习英语。整个夏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问了我数千个问题，问我生活在美国是什么样的。我回到美国后，她还继续给我写信。

1995年，我和姚群再次相遇，但这次是在上海。我们自然都很兴奋，聊了很多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姚群这次不再渴望去美国了。虽然中国国内的生活方式仍然很传统守旧，但在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方面已有改善的迹象。当地政府官员不再检查她的信件和监督她的言行。妇女开始通过时尚的穿着、化妆和发型来表达自我。在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这种物质上的表达形式，而这正是中国解放思想和现代化的最初表现。

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因公出差，我已经去过中国无数次，一般逗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但是，2008年，我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了金融和经济学课程。

这次停留的时间就长了。

在北大教课期间，我遇到了几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与他们谈到我的专业领域，包括信用衍生产品。有些官员通过我的学生认识我，还有一些是我通过其他客座教授认识的。他们私下咨询我，问我如何预测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尽管有些来自财政部的人，但他们不相信我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不过，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地听我分析有关2008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形势。

早在2005年，我就预测到这次危机。2006年，我撰写了一篇文章为“华尔街的纸房子”的文章，长达30页，并送到了美国官员手里。但是，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林赛和前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委员安奈特·纳扎雷斯并没把它当回事。我还把这篇文章送给了政策报道的记者，他们的编辑起初表示有兴趣。可是，读完文章后，他们对我说，监管信用衍生产品的概念对普通公众来说太深奥了。更重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的想法与智囊报刊的编辑方针相违背，而这些报刊都与金融机构有紧密联系，接受他们的大笔捐款。

可以说，与美国官员相比，我所认识的中国官员更容易接受我提出的关于不可持续金融体制的警告。反过来，施祖麟、胡轩文和华而诚等人提供了他们的视角和看法，使我对中国的治理方法有所了解。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方略值得大众熟知。

我曾在一家投资银行做过股票研究分析员，从此预测成了我的职业。虽然早在2005年我已预感到信用危机的爆发，甚至比对短期股价波动还要确定，但我后来意识到，只要是政治家不想发布的信息都很难公开报道。这在以调查新闻和言论自由著称的美国也不例外。

极其不幸的是，世界公民眼睁睁地看着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十几家美国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倒塌。在这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根本没有向公众承认现代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已病入膏肓，需要精心打理。但是，少数有良知的

人，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查理·科布尔，读了我2006年写的关于预测信用危机的文章后，在许多场合问我下一个预测是什么。

我永远不想做出的一个预测是国与国之间的世界大战。但我很担心，冲突有可能日益增加，除非我们采用更加文明的方式来监控国际关系，并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共同解决全球问题。虽然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积劳成疾无异于“慢性自杀”。假如我们不认真对待并处理好小问题，那么，问题会愈演愈烈，最终失去控制。

我们正处在危急关头，需要非凡杰出的世界领袖者。美国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中国已经发挥了部分领导作用。中国的发展和治国方略已在西方广为流传，我希望通过我的视角，鼓励美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消除日益增长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发动一场悄无声息但富有建设性的革命，以重新启蒙和解放人类思想。

新年计划

少数有思想、有责任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对此，永远不要怀疑。事实上，世界从来都是被他们所改变。

——玛格丽特·米德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自己的状况并不满意，对自身的弱点明察秋毫，并下定决心进行改变。我们知道，无论是减肥、戒烟还是其他个人问题，都需要向着目标不断努力、坚持不懈。无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们都要坚定地追求最终的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我们的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纵观历史，不满现状的各界民众曾联合起来发动政治运动来改变国家政策。当美国需要解决宪法赋予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奴隶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时，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就准备为自己的信念不断斗争，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与之类似，20世纪初，妇女奋斗了近40年才获得选举权。

现在，美国面临着另一个令人不满意的时刻。在卡特执政时期，大部分美国民众的“美国梦”慢慢消解，有人称之为“萎靡”状态。这种状况在2008年达到顶峰，表现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反过来，这场危机演变成内部经济危机，需要政府投入数万亿美元来解决债务和持续高失业率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政府治理危机和信任危机。显然，美国人民对国家政治功能的不良状况感到沮丧，也对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表现出焦虑。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可是两年后，他的总统地位就受到了挑战。在当时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夺走了领导地位。美国人开始怀疑，两大政党都无法实现承诺，都无法代表民众利益。通过盖洛普调查和茶党，可以明显看出民众的不满，有些人甚至放弃了美国国籍。

利益的高度两极分化确实分化了国家。我认为，与其说这种现象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对立，不如说是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富

人想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通过持续宽松的金融监管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繁荣。而穷人想要一份报酬丰厚、前途光明的工作，以便使他们的子女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生活水平。因此，出现关注点不一致的问题。如何解决此问题，将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和变动产生深远影响。公众对这些后果感到焦虑和不安，这显示他们对国家可能失去自身竞争优势的普遍担忧。

其实，此时出现这种担忧对美国极其不利。一方面，美国承受着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人要求分享美国人已经享受了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自然会让很多美国人感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拥有超过十亿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吸收了大部分美国早已放弃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印度也吸收了很多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但主要集中在电话客服中心、计算机软件编程甚至法律等服务领域。在这些领域，印度人的水平可以和美国人媲美，但是所需的报酬仅是美国人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美国劳动者感到其工作岗位受到了威胁，而他们的这种恐惧也催生了反华言论和反移民法案。

中国因此成了美国经济问题的一个信手拈来的替罪羊。正如张纯如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中所写，由于美国的种族歧视及其对中国近期成就的嫉妒（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强劲的增长），再加上感觉中国缺少民主，中国就成了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

我使用了“感觉”这个词，因为我在第三章中阐明了中国现在的领导集体在制定政策时，关注的是较大范围的公众利益。攻击中国几乎已经变成了美国电视上的一项接触性运动，左右翼评论员都试图通过诽谤中国来击垮对手。甚至《大空头》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也在一篇题为“关于你需要知道的失败背后的全部原因”的评

论文章中，以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这一现象。这种负面的言论引起了我们的抱怨，加深了彼此间的误解，却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

与英国广播公司等外国媒体不同，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部分时间都在表达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时间让外国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展开令人深思的探讨。而恰恰这些外国人的视角才有可能给美国人带来启示，尤其是在谈论不熟悉的话题时。但是，在受到媒体激烈言辞的激发后，美国人能够采取行动。

纵观历史，美国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一直团结在一起面对挑战，如分工合作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发驾车参加“9·11”后的救援工作。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六十分钟》电视节目报道，2011年，无法还房贷的现象席卷全国，美国家庭对新近无家可归的邻居伸出援手，欢迎他们到自己家居住。

今天，美国可能面临着最严峻的意志力的考验。它不像冷战时期面对苏联这样的敌人那样简单直接。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群雄并起而资源不断减少的世界中，如何与它国共存。这两个方面都会威胁到我们已经选择的生活方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持续而坚定地促进本国经济财富的发展，美国能否开拓出一条通向和平与持续发展的道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担心，西方尤其是美国，将在未来竞争性不断增强而又无法预知的环境中落后。

奥巴马总统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称为新“卫星时刻”。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提出中国的技术优势对美国将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威胁”。这些担忧已经开始催生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提案，比如，美国能源部宣布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但目前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切实的解决方案，还需要对美国自身身份变化的哲学反思以及国家迎

接挑战的决心。

至少与不久前相比，美国一定要全面提升竞争力。竞争者多了，要保住优势地位会更加困难。尽管美国军事实力首屈一指，但单纯依靠军事实力来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即便动用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控制一切事件。其实，美国根本就不应该尝试这样做。

可以说，美国作为全球帝国正处于一个拐点。金融危机揭露了我们金融体系的弱点和监管机制的失察，而这些领域曾被当做是我们的优势领域。另外，美国作为“机遇之地”的国际声望也日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家前途也难以达成共识。尽管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也面临着由于傲慢和惰性失去此地位的危险。

如果新的政策、方法和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的民主制度在这个与我们的制宪元勋生存的时代有巨大差异的世界上更好地发挥作用，那么，保持开放、培养渴望学习的新的行为方式就对美国大有裨益。通过借鉴中国的思想、智慧，美国有极大的机会实现计划，成为最优秀的国家，并能继续作为一个强大而崇高的国家而存在。

从竞争中学习，这是经久不衰的至理名言。美国最好的公司迫于新环境的竞争压力得以发展并生存。与此类似，政府也取决于领导人如何应对形势变化，或发展壮大或失去自身地位。合理的起点就是知道自己最强的竞争对手的战略，然后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形势。

正如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能取得金牌的奥运选手一样，美国也一定要通过以下途径努力提升自己：

重建信任
重新取得失去的公信力
恢复整体性
复兴教育
重写薄弱的法规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消除负面因素
保持对竞争力的关注
将很多美国人身上释放出来的潜力变成现实

简言之，我们应该迫使美国在这个飞速变化、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中重塑自我。这样的建议可能难以让人接受，但美国人对自己的世界地位、奢侈的消费习惯甚至自身道德权威地位洋洋自得的时间越长，美国就越有可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处于防御地位。

如果说，历史上有过和今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类似的时刻，那就是15世纪西班牙人的情况。当时西班牙人通过意大利梅第奇家族的银行家积累了财富和实力。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并通过武力征服，将版图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大陆。当时西班牙的影响和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班牙帝国被称作“日不落帝国”，比英国取得这一称号早了数百年。

然而，由于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依赖外国生产的商品以及参与多场战争，最终导致军事资源匮乏，西班牙帝国时代因此过早地终结了。17世纪时，西班牙变得停滞不前，而其他国家进行了政府改革，提升了自己的实力。到了19世纪，反殖民主义运动又使西班牙失去大量领土。这与当今的美国何其相似。

确切地说，美国并没有参与到殖民运动中去，但是美国进行了